

红色印记

永不熄灭的革命火炬

——李星垣烈士女儿李秀珍《我的父亲》读后

杨亮

盘龙江水汨汨地由北向南流向滇池，几百年来从未改变，就像革命志士们的信仰，永不回头。盘龙江与滇池入湖口的东侧，就是官渡区六甲乡洪家大村。此地虽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却也是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小渔村，也是昆明市，乃至云南省最早点燃共产主义火种的小渔村。云南早期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昆明南校场“八烈士”之一的李星垣就出生在这里。

李星垣(1906~1929)，因革命需要又曾化名李炳、李兴源，昆明县南郊洪家村(即今昆明市官渡区六甲街道办事处星海社区居委会洪家大村)人。李星垣的童年，少年成长在一个较富裕的家庭，其父亲从洪家大村走出后，在昆明黄家庄、塘子巷一带烧窑卖石灰、瓦片谋生。由于吃苦耐劳，经营有方，又诚信待人，生意颇有起色，在塘子巷(火车站)黄家庄一带买了十多家铺面，自用和出租兼顾。李星垣在县立清波中学读书时，逐渐接触到了一些进步思想，心中开始萌发了革命的火焰，为日后投身革命打下了基础。

1926年中共云南特别支部在昆明成立后，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派往滇越铁路和个碧石铁路开展工作。从此，云南铁路工人运动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火红年代”。1927年，已在滇越铁路南段当工人的进步青年李星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中共云南省特委工运委员会委员，受中共云南省临时委员会委派，他与张绍雄、卫兼礼等人到滇越铁路、个碧铁路、昆明火车站、宜良车站开展工作，组织了20多个秘密赤色工会，使铁路工人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展开，为早期云南地下党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以及革命活动的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1929年7月11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引起的昆明北城火药库爆炸，造成死伤千余人，无家可归者达万人以上，殃及圆通街、翠湖一带。爆炸使得昆明城北一带尽成灰烬，可谓“冷风桥边世恩仇，顷刻华堂成丘壑”“残骸断腹覆糊血，甚或灰飞散天末”。9月，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王柏龄来滇，名为慰问灾民，实则要龙云坚决执行其反动的“清共”政策。在10月2日的“慰问灾民”大会上，中共昆明地下市委负责人秦美等在会场燃放鞭炮、散发传单，揭露反动派发动火药爆炸事件嫁祸于共产党的罪恶阴谋，使王柏龄的阴谋在群众面前暴露无遗。10月4日，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下令以共产党组织煽动危害国家的罪名，将中共昆明市委负责人秦美、昆明市总工会主席田定邦，以及李凤友、李星垣、甘汝松、马登云、龙振华、马如卓8人杀害于昆明南校场，史称昆明南校场“八烈士”。

关于李星垣烈士的有关情况，在烈士牺牲几十年后，女儿李秀珍写下来《我的父亲》，这是烈士的女儿对父亲的点滴回忆，也是父亲李星垣在女儿心中的一点点印象，这些印象是碎片化的、支离破碎的，但十分珍贵。因为烈士被捕牺牲时，李秀珍还在襁褓之中，嗷嗷待哺，就这点记忆，也还是她的祖父祖母在日后的抚养过程中告诉她的。但这些碎片化的记忆，对我们了解李星垣烈士短暂而光荣的一生弥足珍贵。李秀珍在《我的父亲》中写道：



李星垣烈士所用印章

我的父亲李星垣(李兴源、李炳)曾任中共云南省特委工运委员会委员，是滇越铁路沿线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以烧石灰作掩护，供应铁路沿线，在昆明火车站、宜良火车站、开远火车站等组建了20多个赤色工会，发动和组织工人革命运动。每次离家数十天，回来时精疲力尽，晚上还点油灯写工作计划至深夜。我的祖父经常指责他，怕他做错什么事后连累了家人。他告诉我祖父和祖母说：他们是为劳苦大众、为振兴中华的大事工作，不会做见不得人的事，请老人放心。父亲后来又在东陆大学对面有个叫双眼井的地方租下一套小四合院房子，表面上是组织手工业社，实际上是刊印地下救国宣传刊物。

当时祖父在世，家里算是殷实人家，但父亲的生活很简单，穿着也十分朴素，对同志和朋友无微不至的关心。当时常来家中的有田定邦，还有后来成为可耻叛徒的罗靖。因他家境贫寒，父亲时常接济他们，留家食宿。见他们没有过冬的衣服，就把自己结婚时好点的衣服给他们穿。组织活动没有经费，他就把祖父给他的生活费用拿出来给组织做经费用。他从小懂事，聪明，待人和蔼可亲，街坊邻居都夸他知书达理，有出息。

父亲牺牲的前几天，有一个穿马裤操“两广”口音的同志来找过他，告之情况紧急要他离家，并告诉家中一定要催他尽快出走。祖父、祖母劝他出去躲躲。但父亲十分冷静，他告诉老人放心，他会安排的。就在此后几天他趁夜色带着油灯清理书籍，撤掉东西，烧毁资料。那天清晨天还不亮就听到房顶有响声，反动军警包围了院子，房顶上还架着机枪。约五点多钟就是紧张的砸门声，而后是军警特务便衣闯入院内，闯入全家老小的卧室。这时父亲从容地打开了房门，制止他们恐吓亲人，从而被捕入狱，母亲也同时被捕特务们抓走。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看到父亲那发黄的照片时，脑海里便浮出祖父、祖母、伯父、伯母给我讲述父亲李星垣早年参加革命活动的故事。他好像一面镜子，一直珍藏在我心里，成为我这一生的榜样，成为我这一生的坚强，成为我这一生的力量！

李星垣牺牲时年仅23岁，遗体由其父回安葬于老家洪家大村村尾农



后排右二为李星垣烈士

田中。沧海桑田几十年，即使在老盘龙江河道整治及高产农田改造的过程中，周边墓地全部迁离时，烈士的墓地仍然完好地保留了下来，这是树立在洪家大村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一支照亮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的火炬。2010年11月26日，由于滇池保护及湿地治理工程的需要，在洪家大村的部分党员、群众代表及烈士族亲庄严肃穆的凝视下，在恋恋不舍的情中，烈士的墓地迁移到昆明北郊龙凤公墓。

当年李星垣英勇就义时，妻子也被捕，后被释放。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再次加害，烈士的妻子有家不敢回，在外颠沛流离，后因各种原因与家庭失去了联系，只留下了一个尚在襁褓中的遗孤，一位刚满一岁、嗷嗷待哺的女儿李秀珍，乳名“宝珍”。可怜的孩子先由祖父、祖母抚养，由于涉及中共地下党家庭，李家遭受迫害，生意从此一落千丈。李星垣的牺牲，老父亲思儿心切、悲愤交加，加之国民党特务不断地骚扰迫害，不久，二老相继撒手人寰。宝珍(李秀珍)交由革命烈士的亲大哥李茂森收养。宝珍成年后经叔伯介绍嫁给了后成为陈赓任校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军政学校云南分校的一位河南籍教员孙聚文，后来随转业丈夫到了河南省许昌市生活，李秀珍是李星垣烈士唯一的女儿。

李秀珍在《我的父亲》中还说道：1952年我带着两个孩子随丈夫孙聚文从解放军西南军政学校教员复员回到河南许昌，我从一个四季如春的城市回到了位于北方的许昌。冬天哈口气都结霜，夏天气温高达36度，加之生活习惯的差异，气候的不适应、语言的不通等意想不到的困难，实在在经受不住，经常整夜啼哭。我总在想，我的命怎么这么苦？甚至没有勇气活下去。这时我就把珍藏在我身边父亲的照片仔仔细细地看，边看边哭，仿佛父亲在微笑着安慰我说：“孩子，一定要坚强生活下去！我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建设新中国，为了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好日子。现在新中国建立了，美好生活必须靠你们去艰辛努力换来！”每到这时我就振作起来，坚定了生活的信念，便得到了无穷的力量。我在豆腐坊挑过水，磨过豆腐，拉过架子车，卖过冰棍，纺过纱，织过毛衣，干过

许多从前从未干过的又苦又累又脏的活，但我都咬着牙坚持下来了，我从未找过有关部门求助，也从未以烈士遗孤的身份向任何组织和机构提出过无理要求，如果那样的话，不是违背了父亲舍身为国的初衷了吗？

旗帜的力量是伟大的，尤其是共产主义旗帜的力量！读《我的父亲》，读后令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李星垣烈士是1927年入党的，就是这一年，中国革命暂时走入了低谷，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最终都因为种种原因，被迫放弃了城市斗争。一时间中国大地白色恐怖笼罩，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员、革命志士。有的人因此脱党，有的人因此变节。而李星垣烈士，却在这种时候逆流而上，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足见其共产主义信仰在其心中的地位之高，足见其信仰之坚定。虽然他仅在入党两年之后就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没有尽到作为父亲抚养儿子的义务，也没有为二老养老送终。但是，他是大孝大义之人，在那暗无天日的时代，他敢于以一腔热血唤醒民众，其精神价值将永存于世。

烈士遗孤李秀珍，从革命家庭中走出，没有因为其是烈士子女而坐享革命成果，幼年遭国民党特务迫害，父母没了。由祖父祖母、伯父伯母抚养长大，吃了多少苦？中年为生活而奔波，受了多少罪？但她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自己是烈士的女儿，是革命者的后代，建设国家、建设家庭，必须靠自己的努力。日复一日的劳动，起早贪黑的工作，既是养家糊口，也是建设国家。这是一个普通人的共产主义信仰，也体现了一位革命烈士后人的高风亮节。

新时代的我们，虽然没有了硝烟与血腥的战争，但我们仍然应该拥有坚强的共产主义信仰，这应该是发自内心的、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我们是李星垣烈士的乡人，也是李星垣烈士的精神传承人。李星垣烈士是千千万万共产党员的杰出代表，是云南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令我们很感动的是，当年的学生们常来看望这位耄耋恩师，行文间尽可感知作者的快慰：

读书札记

民间档案中的生命史

——读日记集《往事悠悠》

石彦伟

这部《往事悠悠》，是马瑞麟老先生继《岁月匆匆》后新近出版的又一部日记集，收录了2020年至2021年的新篇。相较于瑞麟先生纵跨现代两段文学史所留下的众多诗歌经典和儿童文学名作，一本暮年所写的日记短札，固然算不得洪钟大吕，然而品之赏之，颇有些新异感受。

作家日记，历来为文学研究倚重。譬如鲁迅研究者，大抵就不会有人不去研读《鲁迅日记》而妄下结论。有的论者，依据鲁迅日记中对月夜的记述，与创作《狂人日记》的时地背景相联系，甚至查考过万年历，得出了颇有见地的新解。至于胡适、郭沫若、茅盾、郑振铎、郁达夫、叶圣陶、沙汀、柔石等现代名家，皆有丰富的日记文献传世；又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部《作家日记》被公认为其文学遗产中占据要席。

然而，随着信息文明的急速换幕，原始的书面语言好像在顷刻间面临崩解，年轻一代很少执笔书写了。博客初兴那几年，尚有着一股把日记搬上网络的风潮；很快，微博与朋友圈文化的垄断，使记述的能力愈显委顿，以至人们宁可语音留言或通话，也不愿多敲一字。

有板有眼的笔记传统，被席卷而来的新常态逼进了故纸堆，从而变成了时代的奢侈品，但同时，也上那些极少数传统写作，获得了某种神圣化。马瑞麟先生年逾九旬，依然坚持日记练笔，不禁令人惊叹！

纵观这本日记，有对亲友来访的描述；有读书心得、诗文鉴赏；有聚会、出游、民族活动等生活片段；有对水灾疫感、脱贫攻坚、建党百年等时代要闻的感思；当然，写得最多也最富研究价值的，是先生对文坛往事的追溯。

先生自陈：“有的往事令人欢快，有的往事令人惘然。冷暖苦涩的往事，回荡在人生的一生之中。”我们平素理解作家，都是由他的文艺作品，而从日记中，我们得以近距离地触摸作家的真实生活，如观摩一部纪录片一般，逐个单元放大他的生命细节，从而为全景理解马瑞麟先生的创作人生，甚或同时期、同地域、同民族作家的生命成长史，提供了一份不可替代的“民间档案”。

引起我最强烈兴趣的，是马瑞麟先生亲笔的日记体文。虽只是一些零散的回忆碎片，仍不乏文学史价值。例如以下三段：1946年在昆华师范学校读书时，常去拜望住在昆华中学里的闻一多和楚图南，也在该校见过一两次张天虚与柯仲平。

(2020年3月21日)
1947年，在《民意日报》《人生》副刊编辑、作家石凌鹤处，见到著名作家朱自清，朱先生对我刊在文学报上的诗与散文，给了不少热情的肯定与鼓励。

(2020年3月25日)
20世纪中期，沈从文在昆明时，与我谈起他学习写作遇到挫折时，曾得到那达夫的指点及鼓励：一定要写下去。同时，他还说，张爱玲也得到过胡适的指点与帮助；三毛也得到过白先勇的指点与帮助。

(2021年10月5日)
再如，少年时代受到《天方夜谭》《鲁滨孙漂流记》《寄小读者》的启蒙；中学时期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学子的交往；民国时期对《黄河》《父亲和他的黑布衣》的出版及其研究；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邓拓游大观楼的回忆等等。

作为教育家的马瑞麟，毕生献身语文教育事业，桃李满园。日记中散见他早年在明德小学、中华小学、后调入昆明一中教书的经历。令我很是触动的是，当年的学生们常来看望这位耄耋恩师，行文间尽可感知作者的快慰：

“坐下来无拘无束地畅谈了好一阵。”
“夜里，过去教过的新生李瑞平打来电话，说在报上看到我出了新书，很高兴。”
有时，老先生会去回民饭店请来看他的学生吃饭，有时会留在家中就餐，更多时候是学生请他和师母吃饭，常送来牛肉、牛奶和茶点，还为他庆祝了九十寿诞。可以肯定，这是一位多么受学生爱戴和尊敬的老师啊！

有爱的青葱岁月，成就了被爱的晚年。毛姆的《作家笔记》中有这样几句：“一个人年年岁增长，他便会变得较为沉默……他和朋友之间出现隔阂，他意识到他们彼此其实都是陌生人……就连最相亲近的夫妻都不能相互了解，于是他不再与人交往，默默地建造起属于自己的世界，避开每一个人的目光……”

这论断，直击人心。放眼社会，遍地空巢老人被寄存存在一座座荒芜的孤岛上，孤独终老，被岁月遗忘。然而马瑞麟先生，他的家中不仅有常有学生、故友、文友到访，而且儿孙绕膝，四世同堂。他拥有着我所结识的作家家中并不多见的桑榆之暖。

尤其感动我的，是对师母辙啊的记述：“辙啊没有读书的兴趣，但她不干扰我读书，这就很好。”

“父亲与二姐已永远见不到了，万幸的是辙啊与我正享受着幸福的生活。”

“两人聊天当中，彼此越来越觉得对方是一生当中最少不可少的人，越来越庆幸60多年前两个互不相识的人会走到了一起。”

我曾三度拜访瑞麟先生寓所，每次都见到师母。她早年帮先生抄稿子，有了电脑后，又协助他打字，于作家而言，如此贤内助实在可遇而不可求。瑞麟先生能够成为文坛常青树，92岁高龄仍在笔耕，与师母的悉心照料密不可分。本书是一段相濡以沫世纪之恋的见证。

日记中还追忆了作者青年时代与林松、王家谷、纳汝云等云南回族友人的交往，表达了对同辈诗人木斧的悼念，记载了他与中国回族学会、云南明德公益、《云南回族研究》杂志的交往，与高发元、孙玉安、阮殿文、海青青、石彦伟等回族文友及寻甸保甲的交往点滴，还写到了家人到白沙河回族村落的见闻。特别是，2021年5月26日这天，记录了马瑞麟先生为中国回族学会文艺委员会成立发来讲话视频的经过。其时，我正在甘南州首府合作市会场，亲眼这段视频，如果在昆华师范学校读书时，常去拜望住在昆华中学里的闻一多和楚图南，也在该校见过一两次张天虚与柯仲平。

(2020年3月21日)
1947年，在《民意日报》《人生》副刊编辑、作家石凌鹤处，见到著名作家朱自清，朱先生对我刊在文学报上的诗与散文，给了不少热情的肯定与鼓励。

(2020年3月25日)
20世纪中期，沈从文在昆明时，与我谈起他学习写作遇到挫折时，曾得到那达夫的指点及鼓励：一定要写下去。同时，他还说，张爱玲也得到过胡适的指点与帮助；三毛也得到过白先勇的指点与帮助。

(2021年10月5日)
再如，少年时代受到《天方夜谭》《鲁滨孙漂流记》《寄小读者》的启蒙；中学时期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学子的交往；民国时期对《黄河》《父亲和他的黑布衣》的出版及其研究；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邓拓游大观楼的回忆等等。

作为教育家的马瑞麟，毕生献身语文教育事业，桃李满园。日记中散见他早年在明德小学、中华小学、后调入昆明一中教书的经历。令我很是触动的是，当年的学生们常来看望这位耄耋恩师，行文间尽可感知作者的快慰：

“坐下来无拘无束地畅谈了好一阵。”
“夜里，过去教过的新生李瑞平打来电话，说在报上看到我出了新书，很高兴。”
有时，老先生会去回民饭店请来看他的学生吃饭，有时会留在家中就餐，更多时候是学生请他和师母吃饭，常送来牛肉、牛奶和茶点，还为他庆祝了九十寿诞。可以肯定，这是一位多么受学生爱戴和尊敬的老师啊！

有爱的青葱岁月，成就了被爱的晚年。毛姆的《作家笔记》中有这样几句：“一个人年年岁增长，他便会变得较为沉默……他和朋友之间出现隔阂，他意识到他们彼此其实都是陌生人……就连最相亲近的夫妻都不能相互了解，于是他不再与人交往，默默地建造起属于自己的世界，避开每一个人的目光……”

这论断，直击人心。放眼社会，遍地空巢老人被寄存存在一座座荒芜的孤岛上，孤独终老，被岁月遗忘。然而马瑞麟先生，他的家中不仅有常有学生、故友、文友到访，而且儿孙绕膝，四世同堂。他拥有着我所结识的作家家中并不多见的桑榆之暖。

尤其感动我的，是对师母辙啊的记述：“辙啊没有读书的兴趣，但她不干扰我读书，这就很好。”

“父亲与二姐已永远见不到了，万幸的是辙啊与我正享受着幸福的生活。”

“两人聊天当中，彼此越来越觉得对方是一生当中最少不可少的人，越来越庆幸60多年前两个互不相识的人会走到了一起。”

云岭阅读

徜徉在诗歌山水之间

——读张伟锋诗集《山水引》

陈泽

我以为，衡量一个诗人的成功，就是不走别人走过的路，就是读者不经意间读到你的诗歌，会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象。很多年后提起，还能佳句盈口，如数家珍。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让我们至今记得顾城；每次吟咏“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浪漫多情的海子就在脑海中清晰显现；还有，每每想起舒婷写《神女峰》的名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膀上痛哭一晚”，就心生感动，不能自已。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诗人，通过其创作的经典作品带来的魅力。

读云南诗人张伟锋的诗集《山水引》(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诗歌作品不少，如《山中河流》：“我触摸到了，/流动的河水，/是奔跑的慈悲，/它们曾以相同的宽阔和热切之心，/爱恋过别的事物。”其中，最令我眼前一亮，进而内心持续震撼的，就是这句“流动的河水，是奔跑的慈悲”，它给人的感觉非常独特，又十分贴切。在诗评家眼中，所谓“语感好”，大概就是这样的。

当我读到《白露花》的时候，这样的诗句让我反复玩味：“在时光的尘埃中，/有一些故事注定会被遗忘，/谁叫

人间的美好，/总是转瞬即逝。/如果太慢，/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如果太快，/我就闭着眼睛，/和你一起慢慢地祈祷。”而《梨花》中“我在梦里，/黑夜遇见你，/你是晃动的影子，/走在前面，/我却怎么也追不上。”也颇新奇。作者为我们营造出一个美丽又不乏思辨色彩和内涵的情境，让人不知不觉就沉浸其中。

又如《梅影集》：“关于往事，/我将只字不提。/关于黑暗，/你将一无所知”“我本来要去饮酒的，/只是后来遇见你，/就不愿意沉醉”“写诗成为秘密，/爱你逐渐公开”“野鹤载着人心飞走了，/我在荒野上等了很长时间”“我们应该在月光下，/好好合计一下下山涉水的行程。”“我爱一个人，/要送她去寺庙里听钟声，/她有眼睛需要澄明，/她有内心需要宁静”“我的目光穿过酒瓶，/想念一场北方的雪。”雪中自有枯枝败叶，一场中有梅花盛开。”人类的感情是相通的，具有共性特征抑或特质，将它内化为诗，景象为灵动鲜活、温润怡人的文字，就有了不一般的感染力和亲和力，这就是一个真正诗人所表现出来的本事，再如《风向》：“这里的风，/常年只往一个方向吹。/我喜欢在梦里，/亦喜欢你。”这与海子的“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关心你。”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所引这些诗句，看似很随意，却很走心。对我来说，还养眼安神，暖彻心扉。类似这样意味隽永、诗意萦绕的诗句，在《山水引》诗集中还有很多。可以这样说，作者将仁爱善意赋予诗行，慈悲为怀，以显善念，布施善缘。只愿人间多一些安康喜乐，远离灾祸痛苦。



掩卷之余，《山水引》最吸引我的地方，还在于其中不少作品耐咀嚼，有味道，朴素为诗，却空灵曼妙。不矫饰，不做作；有意境，有张力，不刻意；率性而为，真诚示人。自然而然地丰富诗歌

内涵，升华包含其中的情韵意蕴，凸显诗歌特有的特质和魅力。由是，我常常为一些契合心灵意念的诗句击节叫好，进而产生共鸣，它融入了我的认知，拨动了我的心弦，激活了我的情愫。甚至很多时候，如身临其境一般怡然喜悦然，使得在尘世中饱经沧桑的生命，有了些许滋养和抚慰。人们常说的精神食粮的功用，大抵不过如此。

诗歌创作需要技巧和功底，更关键的一点，还取决于作者的天赋，以及与生俱来的聪颖和悟性。当然，离不开作者后天的生活阅历与积淀。多种因素和条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能形成作者笔下意趣扑朔、睿智可掬的诗行，或写景，或状物，或抒情，或思辨，层层递进，情景交融，渐次升华，从容悠然，宁静致远。前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不难看出，在《山水引》中，作者将身上的仁爱良善艺术地融入诗行，以灵动有光的文字，再现晶莹剔透的智慧与感悟。在作者营造的诗歌山水之间，我被禅意引领，被无处不在的圆融法道、温润。浑然不觉间，已忘却喧嚣浮华，身心如洗——也必须如此：“有人消失了，/有一天，是永远不见踪迹。/我在淡水边大喊，/时光啊，你待我不薄，/怀念的人，确实是我。”(《梅影集》)，一遍一遍吟哦着这些撞击灵魂的文字，《山水引》让我感动不已。

阅读与生活

读报阅刊 自得其乐

王祖远

打从2013年2月初开始，我就每天去外面买一份版面清爽、栏目分明的本地晚报回来，寒来暑往已五度春秋，几乎从不间断。碰到喜欢的刊物，也不时买来阅读。不过与其他人不同，我起初买报、买刊，却不单是为了阅读，还缘于一个健身、养生的愿望。

那年因检查心血管，意外发现我的肺部出现了严重病变，必须手术。医院医生大开大合，将我胸腔横切开半圈，再拿掉两叶肺，把比拳头还大的肿块取出。手术做得很成功，我只在医院住了5个晚上就回家了，而且没几天就能独立活动了。可是毕竟少了两叶肺，动作稍大就会引起气急，我不得不想办法加强锻炼，充分发挥所剩肺泡的潜能，以弥补手术给肺部带来的残缺。

正在我考虑用什么方式进行恢复锻炼时，一位病友送了我6个字：“百练不如一走。”我当时对以走代练有点不以为然，但是他把这6个字说得有如古往今来，屡试不爽的绝招，又文诤诤像是出自哪部医学典籍，不由人不信，于是我当下就决定试一试。为了给这一试增加一点动力，我还赋予自己一项使命：天天出去买报，去那个每买一次报就能走得微微沁汗的报刊亭买报。以此，买报便成了我做风雨无阻的一种生活程序。

天天买报，自然是天天都要看的。我看报也跟一般读者不大一样，不是抢读新闻，而是按信息。我是个网虫，每天早晚都雷打不动地要在网上花一两个小时关心时政大事。如今的互联网新闻海量，可是其中不负责任的八卦传闻和

无稽之谈也比比皆是，往往搅得人真假难辨，莫衷一是。

报纸就不同了，一旦印行了，就白纸黑字昭然于天下，具有了较强的公信力，是容不得别有用心、胡乱编造的。正因为这样，当我在互联网上获取了一些比较关心的新闻或信息后，我总要再在报纸上搜寻一遍，看看有无报道或消息，找到了，对照一下，如果内容准确，我便踏实了。若是报上的信息与网上的明显不符，我自然觉得报纸更靠谱，更可信。

读报阅刊，也自得其乐。桌上一杯茶，手中一份报或一份刊，从容不迫地品读，安安静静地思考，这较之一些纯粹的蹦蹦跳跳、下象棋、打麻将之类的娱乐活动，多了些闲适与雅趣。

买报刊，看报刊，看似一件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事，但天天做，月月做，年年复一年，它竟能引出一连串未曾想到的效应。比如我居住的公寓里的部分邻居，见我得了那么严重的肺病，本应该萎靡不振了，没想到几年文学报刊、读报刊，走来走去，竟然已是红光满面，越来越有精神，开始赞叹起来，甚至有阅读爱好的几位，也开始了以走代练、买报刊、读报刊的尝试。更可喜的是，我们在阅读报刊的时候，久而久之受到报纸文艺副刊和文艺刊物的濡染，居然也能效颦似地写起了文章。写文章是典型的脑力活，可延缓脑功能退化，锻炼思维。久而久之，文章居然颇有灵感闪现，甚至得到发表，这真是没有想到的意外之喜，令我喜不自胜，我认为生命由此又增添了广度和深度。